

四編 南京大學特輯 4

# 《京報副刊》研究（上）

陳捷·著

民國文化與  
文學研究文叢

李怡  
沈衛威◎主編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文化  
民國

#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叢文

四編 南京大學特輯

李怡 沈衛威 主編

第4冊

《京報副刊》研究（上）

陳捷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京報副刊》研究（上）／陳捷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2014〔民103〕

目 2+170 面；19×26 公分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四編：第 4 冊）

ISBN 978-986-322-798-4（精裝）

1.報紙副刊 2.文藝評論

541.26208

103012900

特邀編委（以姓氏筆畫為序）：

丁 帆	王德威	宋如珊
岩佐昌暉	奚 密	張中良
張堂錡	張福貴	須文蔚
馮 鐵	劉秀美	

ISBN-978-986-322-798-4



9 789863 227984

民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文叢  
四 編 第 四 冊

ISBN：978-986-322-798-4

《京報副刊》研究（上）

作 者 陳 捷  
主 編 李怡 沈衛威  
企 劃 四川大學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  
北京師範大學民國歷史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  
總 編 輯 杜潔祥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mailto:hml810518@gmail.com)  
初 版 2014 年 9 月  
定 價 四編 12 冊（精裝）新台幣 2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目

# 次

## 上 冊

引 論	1
第一章 孫伏園編輯思想研究	19
第一節 北大「旁聽生」的身份——孫伏園編輯思想探源	20
第二節 孫伏園與新潮社	25
第三節 從《晨報副刊》到《京報副刊》——孫伏園編輯思想的成熟	44
第二章 從文化公共空間到政治公共空間——《京報副刊》的精神轉向	55
第一節 《京報副刊》在媒介序列中的角色問題	58
第二節 「青年必讀書目」研究	70
第三節 時代的風潮中——從一系列「刊中刊」看《京報副刊》的轉向	106
第四節 《京報副刊》與「一報一刊」的鬥爭	136
第五節 「三一八」慘案後的《京報副刊》	163

## 下 冊

第三章 《京報副刊》的文學表現	171
第一節 《京報副刊》小說研究	176
第二節 《京報副刊》戲劇研究	189
第四章 《京報副刊》廣告以及合訂本研究	203
第一節 與文學相關的廣告活動	206
第二節 《京報副刊》廣告與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學術活動	215
第三節 關於《京報副刊》的版式與副刊合訂本	224
結 語	235
參考文獻	237
《京報副刊》目錄全編	243
後 記	325

# 引 論

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社會，正處於一個十分特殊的歷史階段。雖然五四新文化運動給這個階段奠定了文化主旋律，但是在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下，各種社會思潮和文化思潮層出不窮，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是當時社會思潮中最主要的三種，由於激進主義和自由主義在五四之後都被軍閥高壓政治所壓制，保守主義勢力死而不僵，再次擡頭。五四知識分子自由主義思潮在經過一段時間低潮後爲了與文化保守主義塵囂日上的瘋狂反撲相對抗也在二十年代中期再次興起。勢之所至，北京思想界形成了自五四新文化運動後又一個自由主義思想高潮，具有代表性的現象就是一大批秉承五四自由主義精神的知識分子們聚集在相對集中的若干進步刊物周圍，在政治上同軍閥腐朽、黑暗的獨裁統治爭奪話語權力，以爭取國家、民族的獨立自主；在文化上同「骸骨迷戀狂」——以復古主義爲精神圭臬的遺老遺少們以及御用的所謂「名人名教授」做堅決鬥爭，以保衛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文化成果和精神財富。毫無疑問，在面對幾千年層積下來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守舊勢力瘋狂反撲的時候，他們憑藉五四新文化運動啓蒙思想所高舉的「德先生」和「賽先生」——流淌在他們思想血脈中的精神基因——與之進行艱苦卓絕的激烈鬥爭，對舊的思想觀念、文化形態的極力破壞是他們自五四以來一以貫之的文化動機和行爲指南。同時，針對五四新文化運動重破壞而不重建的弱點，他們在教育、文化、政治、社會等多方面提出了針對當下社會文化病竈的一系列解決方案和文化規劃。而同期各種各樣面目迥異的期刊雜誌就爲他們以及受過新式教育的市民階層提供了一個發表自己見解的文化舞臺和言說空間。尤其是在二十年代中期，一大批具有自由主義傾向

的刊物應運而生，它們繼續著五四未竟的文化及社會改造、建設事業，被後人稱為五四時期「四大副刊」之一的《京報副刊》無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1923年胡適在《努力週報》上發表《與高一涵等四位的信》中曾指出：「二十五年來，只有三個雜誌可代表三個時代，可以說創造了三個新時代：一是《時務報》；一是《新民叢報》；一是《新青年》。而《民報》與《甲寅》還算不上。」〔註1〕文史學家陳平原總結了胡適所說可以稱得上「創造新時代」的刊物所應該具備的三個特點：一，有明確的政治立場並直接介入、影響時代思潮之走向；二，應該擁有廣泛的並且相對固定的讀者群；三，有較長的生存時間。〔註2〕按照這個標準來說，在歷史舞臺上只生存了一年多的《京報副刊》並不是一份「創造新時代」的刊物，可是它卻是當時最能代表時代精神及其發展走向的文藝副刊之一。政治舞臺的波詭雲譎、社會形勢的劇烈動蕩、文化潮流的瞬息萬變使得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的歷史環境、文化語境跟《新青年》時期相比，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京報副刊》自身的定位追求、品格氣質以及所存在的獨特歷史階段使得它的發展歷程和精神軌迹既不同於以「平正通達」為特色的商業報刊，如《申報》等；也不同於旗幟鮮明、黨同伐異的機關刊物，如《新民叢報》等；且又不同於以氣味相投為組織原則的同人雜誌，如《新青年》。如果要清晰的認識和描述《京報副刊》的風格氣質、精神輪廓，我們就必須對晚清以降文化環境和出版生態有一個準確的認識。

報刊雜誌的興盛與發達是晚清以來逐漸形成的文化發展大勢，「值此三千年之大變局」的歷史文化狀況是很有價值去追索的。大量外國傳教士、商人創辦的商業性的華文報紙拉開了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的序幕，比如《察世俗每月統計傳》、《教會新報》、《上海新報》等等。報紙設置副刊欄目，最早可以追溯到1872年創刊於中國上海的《申報》，當時編輯者在新聞之後附載詩詞，算是後來報紙副刊的雛形。1883年創刊的《字林滬報》為了擴展刊物影響和促進銷售開創了報紙登載文學作品的新局面，1900年日本人主辦的《同文滬報》也每天附加一張趣味低級的《同文消閒錄》供讀者娛樂。而晚清四大雜誌，《繡像小說》、《月月小說》、《新小說》和《小說林》更是影響了一個時代的文化氛圍和欣賞趣味，在民眾中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梁啟超提出的「新

〔註1〕 胡適：《與高一涵等四位的信》，《努力週報》，1923年10月第75期。

〔註2〕 陳平原：《思想史視野中的文學》，陳平原、〔日〕山口守主編《大眾傳媒與現代文學》，新世紀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86頁。

民說」就是想通過最有效的印刷媒體「製造」出中國的「新民」來，李歐梵認為梁啟超等晚清知識分子的目的是要「同時締造兩樣東西：公共領域和民族國家」。而公共領域的開創和民族國家的建立根據文化學者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像的社群——對於民族國家的反思》中提出的觀點——一個新的民族國家在興起以前有一個想像的過程，這個過程也就是一個公開化、社群化的過程。這一過程依靠兩種非常重要的媒體，一是小說，一是報紙。據此，我們可以更清楚的瞭解 1902 年梁啟超在《新小說》第一卷第一期上發表的名文《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的重大意義。可見當時的文化精英們是充分的認識到了文學和報紙聯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到了五四時期我們更是可以看出新文化運動的先鋒們幾乎都從事過報紙雜誌的編輯工作或是跟報紙有很密切的關係，比如陳獨秀辦《安徽俗話報》、蔡元培辦《警鐘日報》、吳稚暉辦《新世界》、錢玄同辦《教育新語雜誌》、馬君武協辦《新民叢報》、高一涵編《民彝》、李大釗編《言治》、胡適編《竟業旬報》、劉叔雅編《民立報》、吳虞編《蜀報》、劉半農為《小說界》撰稿、周氏兄弟為《河南》、《浙江潮》、《女子世界》等撰稿並籌備《新生》雜誌。可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幟——《新青年》——是在早已鋪就、早已是濃墨重彩的歷史文化圖紙上勾畫新的文化藍圖，當眾多的文化先行者以《新青年》等進步傳媒為舞臺進行革故鼎新的新文化運動建設的時候，文化啟蒙、文學革命借助於報刊雜誌的力量迅速席卷神州大地。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新文化運動全面而迅捷的成功，與其借助新式傳媒、報刊雜誌為傳播手段是密不可分的。

在二十世紀二年代早中期，派別林立的北洋軍閥統治下的北京政府內鬥嚴重，一方面無暇在文化思想界施行高壓統治，另一方面「求新」也成了統治階層的時髦標籤。這樣一種相對寬鬆的歷史環境中，不但從事新文化運動的進步勢力在生長著，而且在文化復古主義思潮的影響下，不少報紙雜誌大肆宣傳封建文化，鼓吹傳統禮教、孔孟綱常。歷史學家羅志田在《五代式的民國：一個憂國知識分子對北伐前數年政治格局的即時觀察》一文中這樣評價當時的北京政局，「北京政局更是一幅典型的新即是舊，舊即是新的混亂圖象。新內閣、新總理、新國會、新勢力、及諸多新人物層出不窮，故『今日都中之所見所聞，幾無一而不新』。但這些新事物中的新人物又皆似曾相識，非安福系即武人，則『今日都中之所見所聞，實無一而不舊』。」〔註 3〕

〔註 3〕 羅志田：《五代式的民國：一個憂國知識分子對北伐前數年政治格局的即時觀

在文化方面，「新而舊，舊而新」的胡適在 1919 年 12 月《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就提出了「整理國故」的口號，到了 1923 年他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之《發刊宣言》上，更加系統的宣傳「整理國故」的主張；而章士釗主持下的《甲寅》之前後變化就更能說明問題，《甲寅》月刊本來於 1914 年 5 月在日本東京創刊，同年 11 月停刊，共出 10 期，章士釗（秋桐）主編，在陳獨秀等人的襄助下前期曾刊登反對袁世凱文章，具有一定的革命意義和積極色彩；1916 年冬，章士釗又邀請時在北京的李大釗和高一涵出任《甲寅》編輯，後經過商議於 1917 年 1 月 28 日出版《甲寅日刊》，同年 6 月 19 日終刊，共出 150 號。在編輯中，李大釗逐漸對段祺瑞政府的倒行逆施明確了認識，他對政府、社會尖銳的批判逐漸與章士釗的「調和立國論」產生了不小的衝突，後來雙方不歡而散；而章士釗任段祺瑞執政府教育總長後，於 1925 年 7 月 11 日在北京復活出版的《甲寅》周刊則宣揚尊孔讀經，反對白話文，攻擊新文化運動，成為封建復古主義者的文化障地。而在南京，1922 年 1 月吳宓主編的《學衡》則以「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為口號，宣傳文化復古主義和折衷主義，在客觀上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攔路虎。

五四新文化運動處身於一個思想自由、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年代，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潮落幕之後，對於那些曾經浸潤在自由思想思潮中的知識分子而言，兩相對照，失落之情尤為深刻。魯迅談到這段時期時曾經說：「在北京這地方，——北京雖然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但自從支持著《新青年》和《新潮》的人們，風流雲散以來，1920 年至 1922 這三年間，倒顯著寂寞荒涼的古戰場的情景。」〔註 4〕魯迅後來在 1932 年《〈自選集〉·自序》中又回憶說：「後來《新青年》的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我又經驗了一回同一戰陣中的夥伴還是會這麼變化，並且落得一個『作家』的頭銜，依然在沙漠中走來走去，不過已經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作文字叫做隨便談談。」〔註 5〕《新青年》解散了，同伴們也已四散，新文化運動處於低潮，在這樣的現實狀況下魯迅形容北京的文化生活就像「在沙漠中走來走

察》，《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4 期，第 44 頁。

〔註 4〕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良友圖書公司 1935 年 7 月版，第 8 頁。

〔註 5〕魯迅：《自選集》自序，《魯迅選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40 頁。

去」，不過我們真正感興趣的是爲什麼魯迅認爲當時自己「已經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了呢？我們只要留意這個時期先後新出現的文藝期刊的名字和數目就或許會找到一些答案：《洪水》，1924年8月創刊於上海；《狂飆》，1924年8月高長虹等人創刊於太原；《語絲》，1924年11月創刊於北京；《現代評論》，胡適、陳源、王世杰、徐志摩等人於1924年12月創刊於北京；《猛進》，徐炳昶創刊於1925年3月於北京；《莽原》，魯迅於1925年4月編輯於北京；《沉鐘》，1925年10月創刊於北京；《新生》，北京大學新生社編輯1926年12月創刊；而《晨報副刊》則是魯迅的學生孫伏園自1921年秋至1924年冬約三年間一直編輯於北京。

只要看看這些期刊以及報紙副刊的名字，我們就不難知道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中期圍繞著這些刊物以及以這些刊物爲舞臺的文化社團、文學社團和個人以及受過新式教育的市民階級已經形成了一個空前的文化交流場域，矢志於要在這個社會當一個「反抗絕望」、「揭穿麒麟下面的馬腳」的文化戰士的魯迅，怎麼可能在大敵當前的嚴峻時刻「逃出去」呢？

《京報副刊》就是在這樣的文化環境、歷史語境的大背景下登上了歷史舞臺。要說到《京報副刊》的創立，就不能不先提到同爲「四大副刊」之一、同樣是北京報界非常著名的文藝副刊——《晨報副刊》。我們知道，《晨報》是研究系（梁啓超、湯化龍等人於1916年8月組織成立的政治團體）的機關報〔註6〕，1916年8月15日創刊於北京，原名《晨鐘報》，湯化龍延攬剛從日本留學歸國的李大釗擔任總編輯〔註7〕。該報後來因爲揭露段祺瑞政府對日借款一事被查封。1918年12月改名爲《晨報》重新問世，它的第七版用以刊登學術新知和文藝作品。在李大釗等人的幫助下，1919年2月《晨報》改組了第七版，從內容上來說，將以前大多刊登一些黑幕題材、才子佳人、倫理說教、梨園軼事等無聊淺薄的內容轉變爲社會批評、婦女解放、勞工問題、學術研究、科學普及、域外文化動態等等煥然一新、洋洋大觀的啓蒙新知。孫伏園在接手《晨報副刊》主編後在晨報社總編輯蒲伯英的支持下於1921年10月12日將它改版爲四開四版的新版式單張出版，改名爲《晨報副鑄》。雖然

〔註6〕關於研究系的詳細研究，請參見本人的《研究系與五四新文化運動關係研究》一書。

〔註7〕李大釗在該刊擔任總編輯的時間極短，1916年9月5日李大釗即以政見不合爲理由離開晨鐘報社，前後任職時間只有22天。

《晨報》正張在政治上擁護北洋政府，但它的文藝副刊在進步力量的推動下，尤其是在李大釗、孫伏園擔任副刊編輯期間，卻是讚助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媒介之一。注重於人文社會科學、進步思想觀念對於積貧積弱的社會病竈的針砭，注重於自由、科學、民主精神旗幟的高揚，注重於健康的生活形態、文化趣味、文學生態的媒介空間的營造，注重於對社會轉型期內文化心理和精神狀態的人文關懷是《晨報副刊》一以貫之的精神特色，尤其是在孫伏園當副刊主編的時期。

孫伏園離開《晨報副刊》的原因，人們一直以來都根據孫伏園在《魯迅和當年北京的幾個副刊》中的認定的那樣，即「1924年10月，魯迅先生寫了一首詩《我的失戀》，寄給了《晨報副刊》（署名為某生者，筆者注）。稿已經發排，在見報的頭天晚上，我到報館看大樣時，魯迅先生的詩被代理總編輯劉勉己抽掉了，抽去這稿，我已經按捺不住火氣，再加上劉勉己又跑來說那首詩實在要不得，但吞吞吐吐地說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理由來，於是我氣極了，就順手打了他一個嘴巴，還追著大罵了他一頓。第二天我氣忿忿地跑到魯迅先生的寓所，告訴他『我辭職了』。」由孫伏園的說法看來，似乎他之所以離開《晨報副刊》編輯職位是由於很偶然的編輯業務糾紛導致自己在衝動的情緒下作出的激情決定。而魯迅在《我和〈語絲〉的始終》也指出，「那時伏園是《晨報副刊》的編輯，我是由他個人來約，投些稿件的人。……但這樣的好景象並不久長，伏園的椅子頗有不穩之勢。因為有一位留學生（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從歐洲回來，和晨報館有深關係，甚不滿意於副刊，決計加以改革，並且為戰鬥計，已經得了『學者』的指示，在開手看 Anatole France 的小說了。……不過我現在無從確說，從那位留學生開手讀法蘭斯的小說起到伏園氣忿忿的跑到我的寓裏來為止的時候，其間相距是幾月還是幾天。『我辭職了。可惡！』這是有一夜，伏園來訪，見面後的第一句話。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異的。第二步，我當然要問問他辭職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關係。他說，那位留學生乘他外出時，到排字房裏去將我的稿子抽掉，因此爭執起來，弄到非辭職不可了。但我並不氣憤，因為那稿子不過是三段打油詩，題作《我的失戀》，是看見當時『阿呀啊唷，我要死了』之類的失戀詩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罷』收場的東西，開開玩笑的。這詩後來又添上一段登在《語絲》上再後來就收在《野草》中。而且所用的又是另一個新鮮的假名，在不肯登載第一次看見姓名的作者的稿子的刊物上，也當然容

易被有權者所放逐的。」<sup>〔註8〕</sup>由魯迅的言論可以看出，他早已意識到在研究系掌控下的晨報館是不會讓作為文學研究會發起人之一的孫伏園來長久佔據《晨報副刊》主編的位置的。孫的離職是「意料中事，不足異的」，因為「為戰鬥計」已經有受到「學者」（指陳源）指揮的留學生要謀孫伏園的位子了。但是他卻對《晨報副刊》拿掉他的文章認為是由於自己用了「新鮮的假名」的緣故所以才「當然容易被有權者放逐的」。事實上，魯迅用「某生者」做筆名並不能說是一個「新鮮的假名」了。早在1922年9月20日魯迅就用這個筆名在《晨報副刊》第三版上發表了《以震其艱深》，同年10月4日和9日分別在《晨報副刊》第三版和第四版上發表《所謂「國學」》和《兒歌的「反動」》兩篇文章，甚至在他創作《我的失戀》之前的五六天，他在《晨報副刊》上就用「某生者」為筆名相繼發表了《又是「古已有之」》和相應的補正篇《答二百係答一百之誤》兩文。顯然，如果用僅僅是因為一個新鮮的筆名就導致了文章被抽走來解釋後來的事件是不充分的。此時的魯迅自然已經是新文學的象徵、思想界和文學界的頭面人物，但是他如此來推測「放逐」自己文章的留學生（即劉勉己）之想法，卻說明魯迅對晨報館中之人尚未完全清晰的看清。這裡補充一則史料，即可看出魯迅的這個推測是不準確的。在1925年12月5日《京報副刊》出版一週年之際，孫伏園在《京報副刊》349號上發表文章《京副一週年》，開頭就借用了導致自己離開《晨報副刊》的魯迅的《我的失戀》一詩，並且詳細的對文本進行了解讀，指出這首詩形式看是「新打油詩」，但「詩的內容仍是他自己的根本思想」。孫伏園「揚眉吐氣」般的細數了該詩三大思想特徵以「估定《我的失戀》這詩的價值」。真正讓我感興趣的是孫伏園對往事的再次敘述，他說，「……魯迅先生做好這詩以後，就寄給我以備登入《晨報副刊》。那時我的編輯時間也與現在一樣，自上午九點至下午兩點。兩點以後，我發完稿便走了，直到晚上八點才回館看大樣。去年十月的某天，就是發出魯迅先生《我的失戀》一詩的那天，我照例於八點到時看大樣去了。大樣上沒有別的特別處所，只少了一篇魯迅先生的詩，和多了一篇什麼人的評論。少登一篇稿子是常事，本已給校對者以範圍內的自由，遇稿過多時，有幾篇本來不妨不登的。但去年十月某日的事，卻不能和平日相提並論，不是因為稿過多而被校對抽去的，因為校對報告我，這篇詩稿是被代理總編輯劉勉己先生抽去了。『抽去！』這是何等重大事！但我究竟已

〔註8〕魯迅：《魯迅選集》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495頁。

經不是青年了，聽完話只是按捺著氣，依然伏在案頭看大樣。我正想看他補進的是一篇什麼東西，這時候劉勉己先生來了，連說魯迅的那首詩實在要不得，所以由他代為抽了。但他只是吞吞吐吐的，也說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緣故來。這時我的少年火氣，實在有些按捺不住了，一舉手就要打他的嘴巴。（這是我生平未有的恥辱，如果還有一口人氣，對於這種恥辱當然非昭雪不可的）。」這裡我們要注意的是劉勉己先生來了之後「連說魯迅的那首詩實在要不得」，可見他在抽去《我的失戀》之時，已經知道了該詩是魯迅所做，這顯然證明魯迅所認為是由於「有權者」抽掉了「第一次看見姓名的作者」的作品這個猜測是錯誤的。明知道是魯迅的文章，還要抽掉！這就是晨報館內部的人要拆孫伏園這個主編的臺，又要挫魯迅的銳氣，真可謂一石二鳥。魯迅在當時是何等的人物，一般雜誌報刊的編輯託人拉關係找他為刊物寫文章都難以如願，而《晨報副刊》竟然要將魯迅的文章抽掉！孫伏園跟魯迅既是同鄉，又是師生，亦師亦友。魯迅對孫伏園的幫助是多方面的，在1918年孫伏園與其弟從紹興進京之後，「孫伏園先入北大旁聽，孫福熙也需要有一著落。魯迅想安插在北大校圖做事，這回可能又是動用了蔡元培的關係，事情辦成了。」〔註9〕要知道，魯迅只是為了自己三弟周建人的工作問題才找過蔡元培，可見他對這兩位小老鄉的關切之心了。而在工作上，魯迅則給了孫伏園極大的支持和鼓勵。在孫伏園主編《晨報副刊》的三年多時間裏，魯迅先生為副刊供稿五十餘篇，著名的《阿Q正傳》也是在《晨報副刊》上問世的，魯迅先生作品的發表給《晨報副刊》帶來的聲譽是難以估量的。可以說，魯迅是孫伏園手中掌握的作家中最有影響力和號召力的一個。劉勉己把魯迅的稿抽掉，難怪孫伏園要認為是「平生未有的恥辱」了。

那為什麼晨報館的人要跟孫伏園過不去呢？這一方面要從身為研究系魁首的梁啟超說起，從政失意的梁啟超、蔣百里歐遊歸來以後，決心要在中國搞文藝復興運動，梁啟超創作的《歐遊心影錄》就設計關於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理想模式，蔣百里也在積極撰寫《歐洲文藝復興史》。為了在中國儘早實現文藝復興的宏旨，他們謀劃在三個方面進行：一，控制學校，培養人才；二，創辦刊物，開啓民智；三，建立社團，完善機構。徐志摩作為梁啟超的得意門生，在1923年3月組織新月社，這是在第三個方面，即建立社團方面

〔註9〕吳海勇：《時為公務員的魯迅》，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114頁。

的努力。一貫注重報紙宣傳、鼓吹功用且此時想大展宏圖的梁啓超等研究系領袖人物面對自己掌握下的晨報館，怎麼能讓一個跟自己並無黨派瓜葛的孫伏園來長久佔據主編職位呢？新月社成立之時，梁啓超就推薦徐志摩去上海研究系張東蓀一派主持的《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當編輯，可惜沒有成功。不過，研究系魁首希望自己的學生去替自己實現文藝復興宏願的意圖是鮮明的。當然，在北京的《晨報副刊》無疑也是個不錯的選擇的。新月社的陳源，也就是魯迅用嘲諷的口吻所說「爲戰鬥計」而指揮留學生謀孫伏園職位的所謂「真正的學者」，他本來對報紙副刊這種媒介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就是質疑的，但在研究系陳博生來找徐志摩請他主編《晨報副刊》時，他卻說，「他本來也不贊成志摩辦副刊的，他也是最厭惡的一個，但爲要處死副刊，趁早破滅這流行病，現在倒換了意見贊成志摩來辦，第一步先逼死別家的副刊，第二步再掐死自己的副刊，從此人類可免卻副刊的災殃。」〔註 10〕陳源如此憎恨副刊的原因呢？我認爲一方面與他在報紙副刊所構築的文化場域中經常處於被抨擊的角色有關，同時具有英國紳士氣的他看不慣在革命風潮激蕩下，青年人在副刊等媒體上的激烈的文化活動與宣傳以及當時流行在副刊上隨意化的創作傾向，1926年1月30日他發表在《晨報副刊》上《閒話的閒話之閒話引出來的幾封信》一文中或許可以說明一些問題，陳源說：「他們（指魯迅，作者注）有的是歡迎謾罵的報紙，我們覺得自己辦的一個報紙如只能謾罵，還不如沒有。」他在這裡所提到的「歡迎謾罵的報紙」肯定是包括《京報副刊》在內。張奚若在徐志摩接手《晨報副刊》後也在《晨報副刊》上發表文章對當時流行在青年學生中在副刊上隨意創作的傾向進行了批評。另外，我們只要對比一下晨報代理總編輯劉勉己對待孫伏園和對待徐志摩的態度的差別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在1925年9月29日《晨報副刊》登出了《勉己啓事》中提到：「……關於副刊日刊各種事務，自本月二十九日起，請徑與主任徐志摩先生接洽。再，晨報副刊向取公開研究態度，此次改革，精神不渝，仍盼海內碩學鼎立匡助爲幸。」可見，要把孫伏園擠走，讓徐志摩這個「自家人」來執掌門戶才是晨報館的真正用意所在。不難想見孫伏園看到這則啓事內心是什麼滋味。

晨報社執意要換掉孫伏園的另一個原因則與當時「嚴峻」的政治局勢有關，換言之，在研究系眼中，孫伏園的編輯風格已經不能與即將到來的「戰

〔註 10〕韓石山：《徐志摩傳》，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01 年初版，第 187 頁。

鬥的時代」相匹配了。1924年10月奉系軍閥張作霖和直系將領馮玉祥攜手推翻了北京以曹錕為總統的直系政權，隨即張作霖、馮玉祥、段祺瑞等人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事。此時業已決心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孫中山先生接受了邀請並提出了解決時局困境的辦法。「因為《晨報》老闆研究系人物，雖可在北洋軍閥面前大談科學與文藝，但中山先生的北上，及他所帶來的政治主張和思潮，已使《晨報》老闆有些恐慌了。於是他們不滿於再起的青年運動，更不滿於孫伏園所編的副刊。因為當時副刊上，不只是登些辛辣的文藝作品，有時還登載批評政治，批評社會的雜感與論文。在這種情況下，伏園被逼而離開《晨報》了。」〔註11〕面對新的政治狀況，曾經十分進步的《晨報副刊》終於跟不上歷史發展的腳步了。不過如果不是因為這個詩歌問題讓雙方矛盾激化，那麼歷史的舞臺上，孫伏園和《京報副刊》很可能就要擦肩而過了。

而在《京報》一面，京報社老闆邵飄萍在1918年10月5日創刊《京報》之前，就痛感當時北京輿論媒體界沒有真正的可以反映民意、可以當作改良社會政治喉舌的報紙。二十年代左右的北京報紙大多都是黨同伐異、依靠軍閥、政黨的支持才得以生存的。《黃報》是山東軍閥張宗昌資助的，《晨報》是研究系控制的，《順天時報》是日本人在指揮，《北京時報》是安福系段祺瑞政府的機關報。邵飄萍在《京報》創刊詞《本報因何而出世乎》中提到了辦刊宗旨：「時局紛亂極點，乃國民毫無實力之故耳。……必從政治教育入手。樹不拔之基，乃萬年之計，治本之策。……必使政府聽命於正當民意之前，是即本報之所作為也！」〔註12〕邵飄萍對報紙的定位，即在政府面前要代表「正當民意」，而在「毫無實力」之國民面前，應該充當一個教育者、啓蒙者的角色。因此，在他眼裏，新聞記者是「社會之公人，是居於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外的第三者」，〔註13〕是布衣之宰相，無冕之王。由於邵飄萍的細緻籌劃和秉持公心的辦報方針，不到一月，《京報》的發行量頭一個月就從300份增至4000份，最高時達6000份。這在當時北京是首屈一指的。在抨擊封建軍閥的黑暗統治、衝擊封建勢力對自由言論的鉗制、高舉反帝反封建的旗幟之外，邵飄萍十分重視新文化運動和文藝作品對改革民眾傳統文藝思想、闡

〔註11〕 荊有麟等：《魯迅先生二三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39頁。

〔註12〕 邵飄萍：《本報因何而出世乎》，《京報》，1918年10月5日。

〔註13〕 同上。

割傳統荒誕、無聊的藝術趣味、建立新型的文藝觀念所能起到的重大作用。著名的報人趙超構曾經說過「新聞是報紙的靈魂，副刊是報紙的面孔，報紙耐看不耐看主要看副刊」。著名的報人金庸也很重視報紙副刊的作用，他認為對於報紙而言，新聞為攻，副刊為守。對《京報》來說，「攻」的一方面是做的很充分了，所謂「守」的這一面是體現一個刊物精神魅力、價值情趣等自身文化特色的一面，也是報紙之間相互激烈競爭以維護自身文化品格和文化形象的一面。「當時京都各報及所附小報，動輒涉及隱私，十之八九有黃色新聞，『看報人及投稿者，狃於積習，以為附張小報無非弄月吟風，故花花柳柳之投稿如矮人國，某報所載者乃不一而足』，於是編輯人員『賴以充篇幅』，否則『稿件日有不敷』、『看報人有所不足』，發行量就會大減。」〔註14〕但是邵飄萍注重的決不僅僅是發行量的大小，隨著《京報》的問世，他延請自己的朋友徐凌霄主編《小京報》，以戲曲、藝術評論為主的副刊。它旨在提高文藝戲劇、尤其是舊劇的地位，但是，《小京報》由於受到了時代風氣的影響，也沾染了很多同時代報刊媒體不良的作風，羅家倫在《新潮》第一卷第一號上《今日中國之新聞界》中，在歷數了北京新聞界副刊的不良風氣以後，對《小京報》也頗有微詞，他說：「兩年以來，更發達了北京的報紙，除了小報幾十種不計外，其餘大報之後，也紛紛增設評花評戲的附張。北京日報從前算是正經一點的，去年也都設了消閒錄登載滿紙的『花詢』。我以為也就夠了，不料他還要印出種種的照片，來替一般倡妓分『訪單』。咳！諸君想想，這是何等行爲！近日上海幾位駐京通信員，辦了一種《京報》算是消息靈通有點眼光的報紙；但是也不免附一張小京報，現在小京報聽說也在徵求『訪單』呢！略舉二事，北京新聞界的情形可以看見了。」〔註15〕1919年8月22日，京報館被封，《小京報》停刊。1920年9月20日《京報》復刊，同年10月23日《小說周刊》隨《京報》印行，後於1921年5月10日再次推出《小京報》之時將《小說周刊》併入，徐凌霄特約紅葉共同主持，後改稱《小京園》。除了星期一外每日一張的《小京園》依然是以關注戲劇為主，旁及其他。欄目主要有劇本、劇談、小說、詩話等，在上面也發表了不少吹捧女戲子的文章，趣味格調也都不是很高。它附《京報》發行，不另外加價。如果要單獨訂閱，則每張兩枚銅元，每月大洋三角，年優惠定價則為大洋三元二角。這

〔註14〕華德韓：《邵飄萍傳》，杭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頁。

〔註15〕羅家倫：《今日中國之新聞界》，《新潮》第一卷第一期。

就是《京報副刊》誕生之前《京報》主要的文化藝術類副刊的歷史流變。

《京報》在發展過程有一個特點就是副刊多〔註16〕，在《京報》的發展歷史中副刊是伴隨始終的：

1920年11月2日～1921年2月19日，《賑務日報》（臨時性質，為華北救災而設）；

1920年12月13日～1921年2月7日，蕭子升主持《海外新聲》；

1922年10月10日～1924年12月5日，《經濟新刊》；

1922年12月27日起，北京高師教育革新社主編《教育新刊》，星期日隨《京報》附送；

1923年1月5日起，中國社會學會編《社會科學半月刊》；

1923年1月6日起，北大經濟學會主編《北大經濟學會半月刊》；

1923年3月28日起，詩學研究會編輯《詩學半月刊》；

1924年11月4日起，勞動文藝研究會編輯《勞動文藝》周刊。

而在1924年年底，《京報》迎來了文化藝術類副刊大爆炸般發展的新時期。1924年12月10日，邵飄萍登出了將附設七種周刊並招納相關編輯的文告，他的目的是「多種附刊輪替發行，周而復始，既不患單調，又不致零亂，於學藝之專研，報章之體例均為有益」。（註17）文告登出後，各種各樣的社團組織紛紛前來接洽，超過了原計劃兩倍之外。利用社會資源和知識團體來辦刊，是邵飄萍的高明之處。邵飄萍於是優中選優，不久，就敲定了副刊集團的「七日成員」：

星期一，《戲劇周刊》，由《小京報》併入，1924年12月8日首發，徐淩

〔註16〕我們將下面這些刊物都歸為副刊類，其實是沿用了一種與報紙「正刊」相對的「大副刊」的概念。嚴格說來，他們屬於傳播專業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知識的專刊，這樣的報紙副刊即是專刊型的副刊。不過也有學者認為專刊並不從屬於副刊，「我國的報紙的副刊通常是指，創辦在新聞類型報紙上集中登載文藝創作、作品鑒賞、散文雜文、知識普及、娛樂小品等非新聞體裁內容並以服務大眾為宗旨的固定版面。報紙的專刊通常指，創辦在新聞類型報紙的集中刊登介紹某一領域情況，探討某一方面學科，研究某一方面專門問題，服務某類讀者群體等專業性較強或專業性較濃的內容文章的固定版面。副刊內容具有廣泛化、大眾化、通俗化的基本特徵，專刊具有探索性、研究性和專門性的基本特徵。」參見楊磊《副刊，中國報紙的女神——關於報紙副刊若干問題的思考（四）》，2004年2月7日《中華工商報》。

〔註17〕邵飄萍：《「七種周刊」在新聞學上的理由》，《京報副刊》1924年12月10日，第2版。

霄主編；

星期二，《民眾文藝周刊》，由1924年12月9日的《勞動文藝周刊》易名而來，由民眾文藝周刊社編輯胡也頻、荊有麟等主編，前期魯迅曾校閱；

星期三，《婦女周刊》，1924年12月10日首發，由國立女師大薔薇社編輯；

星期四，《兒童周刊》，1924年12月18日首發；

星期五，《圖畫周刊》，1924年12月26日首發，後由《莽原》頂替，魯迅主編；

星期六，《文學周刊》，1924年12月13日首發，由綠波社和星星文學社共同編輯，張友鸞、焦菊隱等負責通訊聯絡。33期後改為北京文學周刊社編輯，張友鸞、於成澤等編輯；

星期天，《電影周刊》，1924年12月14日創刊。

後來將《電影周刊》併入了《戲劇周刊》，另設《西北周刊》在星期日出版發行，於1925年2月15日首發，由西北邊防督辦辦公署主辦。而後於同年6月14日將《西北周刊》讓位給《國語周刊》，由吳敬桓、黎錦熙、錢玄同、胡適等主編。

另外，原先的兩種附刊《北大經濟學會半月刊》和《社會科學半月刊》繼續保持。這樣，加上《京報副刊》日刊，就是著名的《京報》十種副刊。<sup>〔註18〕</sup>而這些副刊在1925年11月由於《京報》全力投入到轟轟烈烈的反奉倒段的運動中，除了《京報副刊》外，其他的都停刊了。

與其他的副刊是社會團體、個人主動「上門應聘」不同，孫伏園是邵飄萍從荊有麟處得知孫受排擠離開晨報館後主動邀請孫來主掌《京報副刊》的。由於孫伏園對創辦不久的《京報》的人力、財力、影響力等等客觀條件有所

〔註18〕當時的報紙以一固定副刊為主，同時輔以七日專刊型輪流出版的做法風靡一時。例如在《京報副刊》誕生的同年，《民國日報》也在副刊領域大膽革新，1924年3月24日，民國日報社決定將所有副刊分為兩種，「甲，《覺悟》，每天出版，改為印成16開8頁的報紙型；乙，按日發行一種專門性質的附刊即專刊，一星期輪一遍。這七種附刊是《藝術評論》、《文藝周刊》、《婦女周刊》、《教育周刊》、《政治周刊》、《平民周刊》、《科學周刊》。另有特約附刊《國學周刊》和特別副刊《評論之評論》都在星期日出生。以上9種專刊性周刊，都印成4開4版的小型報紙形式。」參見上海地方志辦公室編寫的《上海新聞志》。從時間的先後上推斷，邵飄萍改革《京報》副刊群並引入「星期副刊群」的做法可能是向民國日報社學習的結果。